

佩里远征舰队上的中国水手吴虹玉

徐 以 骅

陶德民教授出身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但我与他相识较晚。1988年9月29日，还在大阪大学读书的德民由其日本导师的推荐和普林斯顿大学日本研究名教授詹森（Marius B. Jansen）的安排，在普大东亚系作了一次关于日本的中国研究的讲座，当时我作为普大宗教系的博士生旁听了讲座，并在讲座结束后与德民有短暂交往。2006年4-9月德民教授来复旦美国研究中心做访问教授，在此期间我对德民教授的研究工作有了进一步了解，尤其对他关于东亚文化交涉学的早期设想，包括他关于汉语是当时“东亚的拉丁语”等论断，印象深刻。当时我们曾讨论过合作研究计划，其中涉及有关奉命“打开日本大门”的佩里远征舰队的若干轶事。这篇小文，算是对当年所拟合作计划的一种推进。

吴虹玉（1834-1919）是中国基督教史上的传奇人物。他早年随佩里舰队赴美，曾在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镇当过九年印刷工人，并作为联邦军队的一名士兵亲历美国南北战争。归国后吴投身于美国圣公会在华的传教事业，开拓并主持了圣公会太仓、嘉定、上海、宝山四大堂区，为圣公会在中国的建立和中国教会的本色化作出了突出贡献，成为中国基督教一代名牧。

一、佩里远征舰队上的中国水手

德民教授早年关于佩里远征舰队的出了名的研究即《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对日人权外交的启示——写在美日建交150周年之际——》¹⁾一文。该文在对佩里（或称被里、伯里、彼里）舰队远征日本的“人权问题因素”作了归纳的基础上，利用日、中、美三国的档案文献资料，对“吉田松陰偷渡事件”以及美日之间围绕该事件的种种交涉，作了全面细致的剖析。该文的主要贡

献，不仅在于利用了其所发现的关于吉田松陰手书木板的“罗森抄件”等原始档案，而且将“吉田松陰偷渡事件”这段关于佩里舰队远征日本的插曲，抬升到东西方交涉史和美国人权外交“典型案例”的高度来加以讨论。通过此人权事件，该文再度揭示了美国人权外交视国家利益优先于人权关怀、视本国人权高于他人权，以及在人权领域实行“双重标准”²⁾等多重特征，进而批评在历史条件下尚有进步意义的美国人权外交在当下已日益沦为“迫使其他国家开放和继续开放市场”的工具，从而“丧失了其早先的理想主义色彩”。该文最后借平山谦二高度评价罗森以“有无互通、患难相救”为“万国交际之道”的主张，寄托了作者本人对人权外交和国际文化交涉学的理想。当年保护本国在太平洋上的捕鲸业及处理所引发的人权问题（主要涉及海难救援和日本监禁美国船员等）是佩里舰队远征日本的动因之一，而在动物权已渐次作为人权观的扩展而得到更多关注的当下，日本却与挪威和冰岛并称世界“捕鲸三巨头”，这点也颇具讽刺意味。

与“吉田松陰偷渡事件”相比，最终登上佩里远征舰队的中国人吴虹玉的传奇故事，意义要平凡得多。吴虹玉最初的事迹，主要见之于1915年由吴虹玉口述、朱友渔笔录的英文《吴虹玉自传》，该《自传》此前未曾发表，其副本之一藏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美国圣公会档案总馆（编号为RG138-9-12）；中华圣公会名牧朱友渔据该英文《自传》编译了《吴虹玉先生传》，估计是1919年吴虹玉在沪去世后不久由圣公会书籍委办出版的，但对照原文该传记有不少删削；笔者后来根据《自传》原文进行了重译，题为《吴虹玉先生自传》，刊于《近代中国》（2003年第7辑），并撰《关于〈吴虹玉牧师自传〉》一文发表于该辑作为说明；另一篇与吴虹玉自传有关的文章是高宗鲁所译《美国内战中的一位中国兵》（载台湾《传记文学》第27卷第3期），原文为美国人威廉·F. 沃纳所撰，曾发表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兰开斯特历史学会出版的刊物，其内容基本采自英文《吴虹玉自传》，只是对吴在兰开斯特镇的活动略有补充，且译文有不少错误，如将吴虹玉译为吴恒毅等。综合上述传记资料以及档案文献，尤其是现藏于美国圣公会档案总馆的吴虹玉书信以

及吴本人给圣公会差会部的报告等，笔者撰写了《吴虹玉与中国圣公会》以及《美国南北战争中的中国牧师》³⁾两文，对吴的生平事迹作了较详实的叙述。

概括起来，吴虹玉的生平可以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为吴闯荡美利坚的冒险经历；后半部分则是他在中国服务教会的教牧生涯。就前半部分而言，吴亲历了美国乃至国际关系史上的两大事件，即佩里舰队对东方的远征以及美国内战。

吴虹玉 1934 年 8 月 7 日出生于江苏常州阳湖县庵头村，其家世代务农。吴九岁时入乡塾念书，13 岁那年从常州到上海，进入大美圣公会中国布道区第一任主教文惠廉 (William I. Boone) 在上海城内王家码头（不久后迁至虹口）开设的学堂读书，入校的第二年便立志信教，由文主教主持受洗，后又受坚振礼，成为一名教徒。佩里舰队两次驶往日本前均在中国停留，并且返航也取道中国。据吴本人的回忆，“1854 年，受菲尔莫尔总统派遣去日本缔结友好条约的佩里司令所率舰队。有一部分到沪上游览，舰上军官每逢主日便到圣公会做礼拜，该会是当时沪上唯一的美国差会。这支远征舰队中的一艘军舰叫‘萨斯奎哈纳号’ (the Susquehanna)，另一艘军舰我记得叫‘波瓦坦号’ (the Powhatten)。”时入教会学堂已有七年的吴虹玉闻知美舰不久将返国，遂萌发随舰游美之志，因苦无经费，打算靠在舰上打工远渡重洋，此愿望竟得“萨斯奎哈纳号”舰长许可，同时获准随舰赴美的还有两名中国人，惜此两人生平事迹已不可考。

1854 年夏，吴虹玉随“萨斯奎哈纳号”赴美。在舰上，吴虹玉被派给随舰医官 J. S. 马塞史密斯 (J. S. Messersmith) 当侍应生。这支分舰队在海上航行了八个月，途径厦门、香港、广州、日本和南美诸港口。在舰上，三位中国人均着水手服，而且和全体官兵一样须服从军规。没有资料表明吴虹玉等中国人登舰出海办过什么出国手续，与“吉田松陰偷渡事件”差别明显。1855 年 3 月，经过 8 个月的航行，这支分舰队抵达费城军港。1855 年 4 月 23 日，佩里舰队的旗舰“密西西比号” (the Mississippi) 抵达布鲁克林军

港，佩里将军于次日登舰降下他的司令旗，从而正式结束了佩里舰队对日本的远征⁴⁾。

吴虹玉到费城后，被马塞史密斯医生带到老家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镇。该镇奥兰治街上的圣公会圣雅各堂牧师塞缪尔·鲍曼 (Samuel Bowman) 曾劝吴入城中教会学校念书，但吴意欲学习制造业，曾去兰开斯特火车机车厂谋职，因工厂萧条未果，后经邻人启发入《兰开斯特调查者先驱报》报馆学印刷，前后任职七年，还在另一家《每日快报》打过工。1860年6月22日，吴在兰镇地方法院宣誓成为美国公民，成为美国内战前极少数归化美国的华裔公民之一。

吴加入美籍的第二年，美国内战爆发。1863年，南部邦联军队在罗伯特·E.李 (Robert E. Lee) 将军统率下进犯宾夕法尼亚，宾州州长安德鲁·G.柯廷 (Andrew G. Curtin) 紧急招募 50,000 名志愿兵保卫本州并增援联邦军队。吴响应州长号召，毅然应征入伍，准备为反对奴隶制而战。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1863年6月29日，我不顾兰镇友人们的反对，自愿报名参军。因为我认为北方反对奴隶制是正义的。但友人们却认为我不该参军，在战争中冒生命危险，因为我的同胞和家人全在中国，而在美国我既无财产又无亲人需要保卫，大可不必自愿参军。”⁵⁾可见吴的友人不仅见识不如吴，而且还忽略吴已入美籍、当尽国民义务这一事实。

7月1-3日，由于北军在宾夕法尼亚葛提斯堡一役中击溃南军，迫使李将军撤回波托马克河另岸，宾州遭南军进袭的警报解除，故吴所在的连队 (宾夕法尼亚民兵第50步兵团第一连) 并未经历过任何实战。吴在8月15日因服役期满而退役，前后算起来在军中服役48天。据近年来的有关研究，在美国内战期间，总共有超过一百名华人在南北双方的海陆军队中服役，有的还上前线作战⁶⁾，这本身就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中美关系和华人华侨史课题。

二、作为圣公会牧师的吴虹玉

美国内战结束前，吴虹玉已决心返华。1864年2月，吴离开兰镇前往纽

约，搭乘美国奥利芬特公司为上海与汉口舰航运而造的“九江号”轮船出海。5月17日，“九江号”抵达上海，吴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在美国九年的生活已在吴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烙印，他不仅西装革履，对母语也颇生疏，因此当教会当局让他出来做事时，他不得不要求推迟就职以便重习母语。数年后吴大概仍洋气未脱，以至美国圣公会在华主教韦廉臣（C. M. Williams）对他作如此告诫：“更有一事，我敢提出者。即君当多用国文，尤须注意作文，则可助君讲道。更望君改服中服，则易使人亲近也。”⁷⁾

吴虹玉到沪后先至美国领事馆注册，当天下午便去探访了当时美国圣公会在上海仅有的两位牧师汤蔼礼（E. H. Thomson）和黄光彩以及早年教会学堂的同学颜永京。与吴一样，黄光彩和颜永京是在华圣公会乃至整个基督教会的第一代华人教牧。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F. Fairbank）曾把美国海外传教士称为“美国历史上看不见的人”⁸⁾，以此来批评50多年前美国史学对海外传教运动的忽视。然而与美国的海外传教士相比，中国教会的教牧人士尤其是那些先驱者，则更被埋没。在浩瀚的西方传教士的文献资料中，这些中国人常常作为西教士的助手和传教成果而被提及，他们筚路蓝缕开拓教会事业的业绩，实在得不到充分的反映。相比之下，美国圣公会在中国最早的华人牧师黄光彩、颜永京和吴虹玉则比较特殊，这一方面因为他们在美国圣公会在华开教过程中地位显要；另一方面则由于他们本人均能用英文写作，故目前保存下来的关于他们的资料相对较多⁹⁾。

黄光彩生于1824年，曾就读于美国圣公会在厦门所办学堂。1845年夏厦门发生瘟疫，黄光彩双亲与两个兄弟均染疫而死，黄只身来到上海投靠教会。1846年4月12日复活节黄在上海受洗，成为圣公会第一位华人信徒。黄光彩信教后便在上海和周围地区从事传道事工，从1850年起正式担任传道师，1851年9月7日升为会吏，1863年11月8日被按立为会长，成为圣公会在华第一位华人牧师。担任会长后黄先在美国圣公会在华最早的教堂基督堂牧会，1872年起转至虹口救主堂。1886年11月28日黄光彩在服务教会40年后去世，他留下的从1884年8月24日到1886年6月30日的工作日记，

可能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中国大陆华人教牧最早的英文宣道日记¹⁰。黄的大女儿黄素娥曾任美国圣公会圣玛利亚女塾第一任校长，后来与来华不久的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后长期担任圣约翰大学校长的卜舛济 (F. L. Hawks Pott) 结为夫妇，而卜舛济的外祖父，正是受其好友佩里准将之请编纂《美国舰队远征中国诸海和日本实录》(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的美国圣公会著名教牧和官方史学家弗朗西斯·L·霍克斯 (Francis L. Hawks)。

颜永京 1838 年生于上海，其父原籍福建厦门。1848 年颜 10 岁时入王家码头圣公会学堂，并在入学次年的 10 月 22 日受洗入教。1854 年颜 16 岁时该学堂美籍教员将他和另一名学生杨锡麟带到美国读书。1861 年颜以荣誉学生的优异成绩从俄亥俄州甘比尔的建阳学院毕业，获学士学位。数年后其母校还特授颜荣誉文学硕士学位，奖饰其为国家和教会服务的嘉绩。1862 年 1 月颜返国准备投身教事工，然时值美国内战，圣公会财源断绝不能用颜，颜因家庭原因不得不辗转供职于上海英领馆、公平洋行和租界工部局等处。1868 年 4 月 17 日颜由韦廉臣主教按立为会吏，1870 年 10 月 28 日又在汉口升任会长，继黄光彩后成为圣公会在华第二位华人牧师。颜永京受过高等教育，对美国圣公会在华的两所著名高校即文华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的建立都作出了突出贡献，他曾把美国学者海文 (Joseph Haven) 1875 年出版的心理学著作《心灵学》(Mental Philosophy) 译成中文，被视为第一个把西方心理学介绍到中国之人。颜永京作为中华教会的前身——学校教科书编纂委员会 (又称益智书会) 的唯一的华籍成员 (1886-1890 年) 和第二届中华教育会 (1896-1899 年) 136 名成员中的两名华籍成员之一，可说是最早进入教会教育高层的中国人。颜永京 1898 年 6 月 20 日在沪逝世。

吴虹玉参与教会事工后先被指派为汤蔼礼正式助士。1873 年升任会吏，1880 年 5 月又升任会长，成为美国圣公会在华第三位华人 (裔) 牧师。作为传道人和牧师，吴先后开拓并主持了圣公会太仓、嘉定、上海、宝山四大堂区，被教会视为“开辟新堂区的最佳人选”。在上述三位圣公会最早的华人教

牧中，黄光彩主理教牧事工、颜永京擅长教会教育，而吴虹玉则扬名于教会医疗和慈善领域。他早年协助教会举办上海同仁医院，开创了美国圣公会在华的医疗事工，并前后与同仁医院保持了30多年的关系，其中8年完全办理院务，后来则为兼职。在吴看来，中国的基督教徒，十有八九是“病床头的奉教者”，甚至断言“宣扬基督福音如果没有医疗事工的辅助，就不会对中国人产生什么影响”¹¹⁾。晚年吴又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专门收养贫穷孤寡的上海江湾仁德所上，并且几乎凭一己之力，使仁德所成为中国圣公会教友在慈善领域中的一次成功尝试。吴虹玉1919年12月8日在沪去世，享年85岁。是月22日他的葬礼在救主堂举行，吊者有千余人之多。吴所创建的江湾圣保罗堂和三汀沟圣士提反堂都为他立了碑以志纪念。

吴虹玉回国投身教会事工之时，正值美国圣公会在华的传教事业十分困难和萧条的时期。在美国国内，由于内战，圣公会南北分裂，其海外宣道事业在人力物力上均大受影响。内战结束后，圣公会南北两部虽又合二为一，但由于国内宣道事业的扩张、教会内部崇仪派和崇信派之争以及要求参与教会事务的女权运动的挑战，耗尽了整个教会的精力，使之无力旁顾对华传教。在此形势下，黄光彩、颜永京、吴虹玉等华人教牧，对圣公会在华的宣教事业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其中吴虹玉殚精竭虑，成就卓著，服务教会长达54年之久，实现了他曾许下的“中国人自己要在传教伟业中有所作为”的诺言，成为中国基督教会的一代名牧¹²⁾。

三、研究前景

佩里舰队远征东方过程中发生的“吉田松陰偷渡事件”和吴虹玉登舰赴美两个插曲，并无多大的可比性。有“明治维新之父”之称、且有汉学和兰学双重背景的吉田松陰及其同伴的“偷渡”完全是预谋和强烈目的性的，用德民教授的话来说，其部分历史性意义就是“前赴美国学习先进军事技术，标志着日本的西学开始由兰学转向英美学”，而且成为“震惊日本全国的一桩公案”；而吴虹玉尽管个人具有冒险精神，勇登佩里舰队以远渡重洋，在美国

内战中也表现出高人一等的见识，但其社会关系和知识储备等方面都有欠缺，也不代表任何社会阶层，加上中国社会制度和对外开放的内生动力与日本迥异，因此就像吴的老同学颜永京以及稍后的留美学童等最早的中国留美学生一样，这些零星个案或局部改良注定不可能对中国社会转型产生全局性的影响。

不过，吴虹玉等早期华人教牧对我国基督教倒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鉴于在士绅阶层传教受阻，早期入华的大部分西方差会几乎从一开始就采取学堂、医堂和教堂并驾齐驱的所谓“福音布道三位一体”的传教策略，尤其强调教会教育和医疗事工，即通过“西方化”来实现“基督化”。在这种差传策略的指导下，各大基督教宗派争相建立起包括教育、医疗、慈善、赈济、出版等事工在内且盘根错节的庞大教会系统，该系统对教会自身早期培养的人才及其后代形成虹吸效应，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内循环”；又通过对教育、文化、经济、政治生活的广泛嵌入或外循环对广大社会产生溢出效应，从而对推动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直接作用。就此而言，无论是被佩里舰队带去美国的吴虹玉还有美国圣公会早期的用人政策和教牧培养模式还是相当有效的。佩里远征舰队访日的隐性目的之一就是传播基督教，至少受雇于佩里的首席翻译畏三卫（S. W. Williams）如此认为。佩里舰队东方之行的宗教目的及影响，以及更宽泛的课题如中日两国基督教差传路线之异同，尽管均已有了初步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

佩里舰队东方之行的主要目的当然是打开日本国门，但如其官方记录《美国舰队远征中国诸海和日本实录》的书名所表明的那样，该舰队还到访过“中国诸海”区域内国家如锡兰、新加坡等，尤其是多次往返于中国的广州、香港、澳门、厦门、上海、台湾等地，并五次进入当时还是中国属国的琉球。因此佩里舰队远征的主要目的固然表明日本在美国对外关系尤其在其远东扩张构想中战略地位的提升，并且成为日本对外开放和社会转型的重大开端，而对其的研究在学术上也意味着对以中国为重心的东亚国际关系史的某种调整，但如果仅仅聚焦于其日本之行，那么关于佩里远征舰队的研究同样是很

不完整的。

目前，中国大陆学界关于佩里舰队远征的研究还相当欠缺，除极少数专题论文和若干硕士论文外¹³⁾，尚未形成学术专著或博士论文级别的研究；而关于佩里舰队在中国的活动虽偶有涉及，包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佩里因局势不明朗拒绝清政府要求美舰介入中国事务的“中立立场”等，但相当不充分，如参与佩里舰队两次访日的“普利茅斯号”（the Plymouth）护卫舰及其舰长开利（Commander Kelly）在1854年4月3-4日上海的“泥城之战”（泥城即今西藏路桥一带）中所起的作用¹⁴⁾，就几乎不见于国内史著，该战役是英美法政府及其军队联合上海万国商团第一次用武力对上海租界实施所谓保护，并在其后迫使清政府与英、法、法领事签订了《上海海关征税规则》和《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章程》十四款，扩大了租界权力，这对中国主权造成严重侵犯。佩里远征舰队访日被当时闭关锁国的日本称为“黑船事件”，但仍以和平收场；而对已被迫开放口岸并设立租界的中国而言，“泥城之战”中的美舰执行的则是典型的“炮舰政策”了。显然，对佩里远征舰队的研究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註釋

- 1) 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4年4月第28期。
- 2) 指美国对日要“伸张其国民人权”，其国内在南北战争后却仍实施种族隔离和歧视政策的“灯下黑”行径。
- 3) 两文分别刊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6期。
- 4) Francis L.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 1852, 1853, and 1854* (New York: A. Appleton and Company, 1856), pp. 584-585. 佩里已于1854年3月乘坐英国邮轮“印度斯坦号”离开香港回国，并于1885年1月12日抵达纽约。
- 5) 吴虹玉著、徐以骅译：《吴虹玉先生传》，《近代中国》2003年第7辑，第297页。
- 6) 可参见郭代伟的几篇博客文章，如《探寻康州以为美国内战的华裔军人》，2020年4月4日，<https://m.sciencenet.cn/blog-1122825-1225586.html?mobile=1>；《南

- 北战争中的华裔军人》，2017年12月16日，<https://sciencenet.cn/blog-1122825-1089985.html>；以及《揭秘美国南北战争中的中国人》，2009年7月16日，https://news.ifeng.com/history/1/midang/200907/0716_2664_1251989.shtml。
- 7) 朱友渔编译：《吴虹玉先生传》，圣公会书籍委办出版（无出版日期），第3-4页。
- 8) John K. Fairbank, "The Assignment for the 70's,"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4, no. 3 (1969), p. 877.
- 9) 黄光彩和颜永京的生平事迹可参见徐以骅：《圣公会三位华人牧师之研究》，载徐以骅：《中国基督教教育史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6-102页；徐以骅：《颜永京与圣公会》，载《近代中国》2000年第10辑，第193-215页；Xu Yihua, "Westernization and Contextualization: A Study on Three Pioneering Chinese Pastors of the Sen Kung Hui in China," in Peter Chen-mian Wang, ed., *Contextu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 Evaluation in Modern Perspective* (Sankt Augustin, Germany: Institute Monumenta Serica, 2007)。
- 10) "Letter to Joshua Kimber, June 23, 1885 (including a selection of his journal from August 24, 1884 to May 24, 1885)," in *Archives and Historical Collections of 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 in the U. S. A.*, RG64 (file number)-BOX40; "A Selection of K. C. Wong's Journal, from July 15th 1885 to June 30th 1886," in *AHCPEC*, RG64-BOX40.
- 11) "Extract from a Letter of Mr. Woo, December 13, 1881," in *The Spirit of Missions*, vol. 47 (1882), pp. 107-108.
- 12) 此段文字，参见徐以骅：《吴虹玉与中国圣公会》，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第46页。
- 13) 如在2013-2016年间，大陆高校出现一批关于佩里远征舰队的世界史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包括林贞贞：《佩里舰队与琉球开国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刘啸虎：《十九世纪中叶美国人眼中的琉球——以佩里舰队在琉球的活动为中心》，中国海洋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蓝红玲：《马休·佩里的远东扩张构想和实践》，山东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吴玲霞：《1853-1854年美国特使马修·佩里出使日本的使命》，浙江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林孝斌：《卫三畏在美国远征日本过程中的作用及影响研究(1853-1854)》，福建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
- 14) "泥城之战"表面上由上海的英商祥泰银行一对英国夫妇在跑马场附近散步时与清军发生冲突而引起，实际上是由英美法等国为保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策动的。可参见上引 Francis L.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p. 581-584。